
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義爆發，被視為推翻滿清專制的辛亥革命之開端。作為當今世上唯一的百年中文報紙，《大公報》從廣州起義、四川保路運動起便對這場革命忠實追蹤，辛亥革命期間更是完整記錄，直至辛亥革命後期清帝溥儀退位、袁世凱復辟均未有懈怠。

回顧辛亥百年，紙上記憶依舊鮮活。本報特推出《辛亥百年·大公映像》系列報道，敬請讀者關注。

◀《大公報》創辦人英斂之

◀《大公報》對辛亥的報道首發於1911年10月12日 隋曉姣攝

憂國之動盪

憂民之所傷

《大公報》忠實記錄

辛亥革命

在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，革命派與改良派思潮並行且對峙交鋒激烈，而當時主政《大公報》的英斂之是位「獨有天人悲憫念」的天主教徒，出於對戰亂傷民的擔憂，他主張緩進的君主立憲。但難能可貴的是，對辛亥革命《大公報》雖然不贊同，卻絕不無視之，而是在新聞板塊忠實及時地記錄、力圖完整地呈現。

本報記者 孫志 實習記者 隋曉姣

儘管依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侯傑歸納，當時的《大公報》「替窮苦大眾說話、大膽評說晚清政局、關注社會現實、敢言人所不言」，但辛亥革命發生後《大公報》更多是持不贊同的態度，用新聞史學界泰斗方漢奇先生的話說，「英斂之主持下的《大公報》，懼怕暴力革命，唯恐動盪會帶來滅頂之災，辛亥革命前一面力促政府進行立憲政治改良，一面同情革命者，勸其放棄暴力。」

忠實及時 報戰事

《大公報》對辛亥革命報道的首發是在1911年10月12日一封來自朝廷的電旨，內容是清廷表揚當時的湖廣總督瑞澂撫亂迅速。而從10月13日起，《大公報》對武昌起義的報道可謂連篇累牘——13日的《武昌革黨起事之警電》和《京師戒嚴之近聞》佔據了主要的新聞版面，14日起更在「要聞」欄目中常設《武昌亂事近聞一束》，追蹤起義進展情況。而「湖北」、「四川」等地方欄中也多有關於武昌起義的報道，如《革黨入川之消息》、《鄂亂事前戒嚴之續聞》等，力圖詳盡地呈現全國的局勢。及至《禁城警戒之森嚴》等文章，則對大城市受革命影響的狀況進行了細緻的描摹。

《大公報》一面對革命進行忠實報道，一面怒罵失職的官員和將領，這些報道為人們勾勒出一幅幅活生生的清廷腐敗無能、驚恐無措的畫面。

辛亥革命後期，關於革命的相關消息更是無日無之，通過開評、來論、社論等多種方式，《大公報》對革命的評述和參與十分積極。

憂國憂民 評時局

從客觀環境的角度講，辛亥革命的爆發具有一定的突發性和偶然性，缺乏必要的心理準備和組織準備，中國的社會政治走向，即使是當時的革命領袖也沒有完全想好——從後來的二次革命、北伐戰爭，長達十數年的軍閥混戰狀況中便可見一斑。

適時《大公報》相繼發表了《受鄂亂之影響者》（1911年10月26日）、《亂事久延之最可慮者》（1911年11月13日）、《此次革命時期中國民之損失》（1911年12月16日）等多篇特稿、評論，勸說革命派息止干戈，主要出發點是同情飽受戰亂之苦的普通民衆。

而10月末至11月初的《為本埠人心慌亂正告大吏與居民》、《論各地亟宜組織民團》、《論宣告獨立為通權達變之至計》等文章，則針對革命時期的混亂局面提出諸種建設性意見。

在11月18日的《論今日政體上之解決》中，《大公報》聯繫對比英日美法普魯士等國家的政體，提出聯邦帝國制度方為解決之道。而11月26日《大公報》更發布「君主民主立憲問題之解決」的微文小啓，強調「非第本報之光，當亦憂國者所極願發抒所見者也」。侯杰教授認為，這種有獎徵文的形式能有效刺激讀者廣泛參與和積極討論，有助於啟發人們思考，加深媒體和社會間的互動。

針砭時弊、憂國憂民、竭盡心力、呼籲勸止，是《大公報》在辛亥革命早期言論的寫照。而混亂傷民生則是它批評的主要出發點。「它既不堅定不移地支持某種政治勢力，也不完全反對任何一種力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該報始終沒有詆毀革命之意圖，即使是針對革命期間造成的各種破壞的報道，也都是從戰爭危害社會民生的角度進行的。」針對《大公報》辛亥革命時期的報道，方漢奇先生在他所著的《大公報百年史》中如是評價。事實上，《大公報》在此期間的建設批評和積極參與，正完整映射了辛亥的歷史圖景。

譴責嘲諷 袁世凱

1912年2月12日，清帝宣布退位，意味着革命派與改良派的爭論告一段落。2月23日，《大公報》版面大調整，改用大中華民國紀年。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，《大公報》的系列報道更充分體現了敢言本色。

《大公報》對袁世凱的懷疑，早在清廷起用袁世凱以平定「鄂亂」時即存在，以「治世之棄物，亂時之能臣」表達對袁氏的懷疑。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前，《大公報》以《論袁項城被選總統》為題，梳理袁氏幾十年駕馭權術的生平行迹，抑揚之間不乏諷刺。後又以《其所以為人才內閣乎？》、《報紙之責任與價值》等文章批評袁世凱徇私專制及壓迫言論自由。

在袁世凱確立終身大總統地位妄圖稱帝之時，《大公報》又在「開評一」撰文嘲諷譴責：「今天總統既能上契天心，下孚衆望，不妨一連任再連任，十連百連乃至無疆連。」1915年袁世凱接受袁世凱專國的「二十一條」時，《大公報》以嘲諷對之，同年11月20日袁氏將復辟帝制付诸實施後，大公在29日以代論刊登梁啟超的《國體問題與五國警告》，鮮明反對再改民主共和為君主立憲。

1913年5月13日，《大公報》刊發社論《論我國今日不可再亂不能再亂之理由》，「居然以最短促之時期，最詭譎之政策，推翻帝制，改建共和。非但曠古所未聞，抑亦全球所僅見。」概括辛亥革命的缺憾之處，在此間《大公報》則始終堅守「民之口舌」的定位，對戰亂頻仍、專制腐敗予以堅決抨擊。

◀《大公報》針對袁世凱復辟刊登梁啟超的《國體問題與五國警告》

開評一

（《大公報》1911年10月13日全文摘錄）

粵亂甫平川亂旋起，川亂未已鄂亂又生。亂機之伏，幾如遍地，火星隨處可以觸發。我瞻四方憂虞靡所聘，其今日之謂歟。

然而粵亂之終局以一件黃馬褂一張大保案了之，川亂雖未終局而兵費既許作正開銷，則將來欽至策動定有懣賞懣官之一日。鄂省僅拿獲數人而地方文武已得擇尤酌保。

吁嗟！革黨。吁嗟！川亂。何苦以滿腔頭血，為食肉者升官發財之資料乎！噫，可以休矣！

【點評】

文章首先描述了廣州、四川、武漢接連發生革命的客觀情況，然後筆鋒一轉指出廣州起義的結果不過是「以一件黃馬褂一張大保案了之」，同樣四川保路運動雖未結束但朝廷已許諾給予充足軍費，並慨嘆革命黨何苦以自己的性命犧牲為統治階級升官發財鋪路呢？以此勸告革命者不要繼續下去。

早期的《大公報》言論欄目很多，「開評一」即是常設欄目之一。這篇評論發表於1911年10月13日，武昌起義爆發後的第三天，在當時的情形下《大公報》的主政者難以預料辛亥革命真的成燎原之勢推翻了腐朽的清廷統治，因此發表了這篇同情、勸止革命者的文章。

此次革命時期中國民之損失

（《大公報》1911年12月16日社評摘錄）

凡事此方面受損，必彼方面受益，甲方面有失，必乙方面有得。惟用兵一事，則雙方交受其損受有所失。故當戰禍未啓之前，必預籌損失之輕重，及損失後收回之權利，而後可以一戰。反是則損益得失之數，不能相償，智者不為也。

革命軍之起事也，非欲損君而益民乎，非欲使君失而民得乎？然試思兩月以來，革軍中所傷之性命，所耗之軍需，共見為國民之損失者，已不在少數。而官軍中所傷之性命，所耗之軍需，何莫非國民之肝腦之膏血乎？不但此也，兵亂各省，百業廢歇，土匪橫行，暗中之損失者，尤屬不貲。即最號安靖之北方數省，因受亂事之影響，而士休其學，工輟其業，商賈停其貿易，以及金融之因滯，遠徙之耗費，非經五年十年之休養生息，不能回復其元氣。加以事定之後，外人之賠償，軍隊之蒐集，城郭宮室之繕完補葺，其連帶發生之損失，又不知幾千百萬。

為問我國民拚此無量代價者，非欲所益之大於所損，所得之逾於所失乎，今何如哉？朝廷所損失者，除三五親貴之權位，少數滿人之性命外，更復有何長物。使當武漢既定四方響應之初，即與政府開正式之談判，政府方倉皇失措，敕死不暇，即於十九信條之外，更增定數條嚴重之約，亦未始不唯唯惟命，則漢陽江甯免幾番血戰。損失既可減少，而所益所得之數，或且較優於今日。

而乃元進至悔，塗炭無窮，惹起外人之干涉，仍不得不出於和之一途。國民庸尚有幸，則前此之損失，猶得謂不可少之代價。後此之損失，不且如擲虛北之黃金乎。如天之福，指日行成。取其官權，讓其虛榮，汲汲焉與利除弊，徐圖富強，天下事尚可為也。若徒斤斤於無謂之君位問題，不恤抖擻全力以搏之，損失愈多，抵償愈難。中乾而外亦不強，途窮日暮，追悔奚從，此則大可惜耳。愿我國民，熟思而審處之。

【點評】

以類比總引文章是《大公報》社論的一大特色，《此次革命時期中國民之損失》也概莫能外。作者首先指出事物之間通常有得有失，唯有用兵打仗是雙方都受損的事。革命起事難道不是為了傷君主益民生嗎？如今無論軍人的生命還是軍需的消耗都是國民之膏血，而百業廢歇所造成的暗中損失則更甚。損失如此代價的目的應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好處，如今過於亢進，生靈塗炭，外國干涉，最終仍要以和談為出路。

雖然也認為近代中國社會到了不得不變的時候，但當時主政《大公報》的英斂之不贊成暴力革命，因為急劇的革命固然可以推進社會的發展，卻使普通民衆飽受戰亂之苦，而傷民生正是《大公報》勸誡革命者的根本出發點。



▲袁世凱像

▲►針砭時弊、憂國憂民，是《大公報》在辛亥革命早期言論的寫照 隋曉姣攝

►《大公報》1911年12月16日發表社評《此次革命時期中國民之損失》

▼位於天津的《大公報》報館舊址

